

## 绪 论

1、1967 年,《社会科学通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杂志上<sup>①</sup>开设了一个专栏 面向当时开始形成的各种潮流的“符号学研究”。就在上一年 罗曼·雅格布森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于波兰的卡齐米日市(Kazimierz)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积极主张创立“国际符号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从 1969 年开始,“符号学”专栏在《社会科学通讯》杂志上消失了,而是单独变成了一份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符号学》(*Semiotica*)并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该杂志成了符号学哲学<sup>②</sup>的一个论坛,来自全世界的相关思考均可以在上面发表。相反,这份新的杂志却几乎不给符号学理论以任何位置 尽管这种理论在索绪尔于巴黎和日内瓦库特奈(Courtenay)和克鲁斯杰夫斯基(Kruszewski)于俄国所进行的语

① 该杂志由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sociales)与高等应用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联合出版。

②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埃柯(Umberto Eco)对于其几项主题进行的简要阐述而尤其是《符号》(*Le Signe*)一书(Labor 出版社,Bruxelles,1988,P.151—206)来想像这种符号学哲学。

言学家的研究成果后来的延续之中，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知识积累过程。

这种几乎是排斥的态度，给受符号—语言学启发的符号学理论此后（至今还是如此）在大范围内的传播造成了明显的困难。毫无疑问，必须说明一下这种情况。这么一来，人们便进入了符号学的一种历史的细节之中，这种历史部分地与本世纪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混合在一起，但人们又几乎要丢掉一系列源自符号学的另一种历史即符号—语言学理论之历史的概念探索和重大发现，而这种符号—语言学理论的历史正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感兴趣的。

2 搞出一部符号学理论的概念历史，是不是有点过早呢？即便设想 1966 年卡齐米日研讨会的决定仅仅是为此前早已真正进行了几十年（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的一种研究潮流提供了更多的国际前景，并且这种研究因此也已经开始载入了历史的进程之中，但是，那些年的分散性探索，作为初露端倪的一门脆弱的知识，值得大书特书吗？对于有关意指各种形式的尚难于做出的表述之真实价值发表看法，是不是过早呢？格雷玛斯和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成果，作为符号学理论最为得到发展的内容，也并不激励人们急于去做历史性的总结，因为这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理论也经常放弃自己的主张。1983 年出版的《论意义之二》难道不就是想否定 1970 年出版的另一部《论意义》吗？作者在绪论结尾处这样写道：“某些工具性概念由于穷尽了它们的启发性价值，接着出现的情况就好像是这样的：一种设想，例如建构可以创立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确定新的符号学对象的一种符号学方式性句法，在十年的集体努力之后，就已经准

备被取而代之了。只要是出现了一种扩充危机或是一种决定性的返回，符号学的一种新面孔就一点一点地出现了。”

1992年2月，格雷玛斯的去世曾经使这种理论上的探索极为神秘地停止了一段时间，这一方面使关注符号学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有了困难，另一方面从此时开始也使人们重新回顾这种探索的过去、其前人或其先行者，以试图（如果不说是建立符号学历史的话）制定一种其理论建立的历史分期。这样来审视格雷玛斯及其学生们的著述，它们便进入了自索绪尔1879年发表《论欧洲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européennes*）一百多年以来出现的整个发展进程之中了。

3. 我们曾经认为 即便我们不希望深入到这些具有完全的不可预见性、同时又迫切需要真正的智力突破的思想事件之中，我们还是至少能够尽力来讲述一下（将个人生平与有关观念和派别的历史混同介绍）那些曾经改变了人们对于意指现象之认识的重大操作性概念得以形成与建立起联系的方式。我们尤其详细地介绍了索绪尔的智力历程。尽管这位学者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与符号学的关系并非可以直接地看到。为什么要闲扯一些与符号学理论化的关键历史无关的内容呢？讲述为其同辈人所不知或为历史所阻碍的这位天才之痛苦，有什么用呢？在我们看来 在这种全新的思想出现的情况里 应该采取将纯粹的概念考虑与某些逸闻不予分离的做法，因为曾经热情地伴随着理性发现的启迪活动和价值化过程就有意表露在这些逸闻之中。同样 我们曾经试图 借助于某些资料的准确性 几乎是象征性地）对于作为这些发现的社会环境的传言和争论发表看

法 以便我们至少借助于想像可以设想一下 社会—语言学观念的美好时代在索邦大学那里是什么，文学的十月革命在莫斯科和在涅瓦河沿岸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种阐述并不是毫无意义，哪怕就算是对于我们要阐述的那些极为枯燥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运动作一些补偿，也无不可。

4、相反 在有的著述中 巴黎符号学学派最新的研究工作，只是以与格雷玛斯多次在其作品中建议的历史分期相一致的一种历史分期形式 给予了非常简要的介绍<sup>①</sup>。因此 我们决定区分时间上的前瞻性介绍与现时的理论争论，同时在《我知道什么》丛书里另外撰写 与本书并行 一本《符号学》（*Sémiotique*）来介绍这门学科的系统分类学，而不再介绍其历史。正是在这第二本书<sup>②</sup>中，格雷玛斯和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同样 在第二本书中 欧洲符号学理论与皮尔士开创的美国符号学探索之间的对立问题也得到了阐述。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讲 作为索绪尔的同时代人 如果皮尔士这位有关符号及意义的哲学先驱者不出现在这本《符号学简史》中 人们将认为是不正常的。其之所以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 理由是这样的 直到最近一些年，皮尔士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涉及到的理论探索的发展中

① 尤其参阅《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 20 卷，N°3 第 539—550 页，巴尔迪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9 年春。

② 据译者向出版社（PUF）所做的了解 这本《符号学》并没有出版 但作者在 2002 年主编出版了《符号学问题》（*Questions de sémiotique*）一书 意在汇总源于索绪尔理论和美国皮尔士理论的符号学研究的总现状。——译注

未起到任何作用<sup>①</sup>，而人们今后在欧洲会目睹一种极为深刻的阅读（参阅《符号学》第三部分）这种阅读有可能在整个符号学世界得到很大的反响。反过来讲，欧洲的符号学已开始跨越以前与美国符号学相对立的关键性障碍，正通过对于大洋彼岸的阅读进行反思，并在对于自己是反证的解释当中获得一种启迪。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意味着当前，一种有关美国传统的介绍就像符号学版图的整体一样，可以在本着定理性和共时性的一种观点进行的符号学探讨中，而不是在对于一套严密的理论（人们在后面可以注意到这种理论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的连续发展情况）进行这种简短的论述中，更为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依赖幻觉有关符号学的一种真正的历史在目前还是无法写出的。只须想到《符号学史》（*Histoire de la sémiotique*）一书的出版商们（也许是草率的出版商）从那时起为符号学规定的任务和研究内容就足够了<sup>②</sup>。不过，我们认为，我们依据历史顺序整理的这一份材料，尤其可以为试图进行实际操作的人们能够从符号学理论方面了解到的东西提供—些前景—种新的和必要的看法。它还依据所获知识的先后，向那些无任何符号学学识的人们提供一种真正的介绍。

依据历史顺序（仅与其真实的历史有一点点联系，这种真

① 这种看法为所有的证据所印证，尤其参阅让娜·马蒂内（Jeanne Martinet）（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报告，苏格兰，1980），或是参阅桑多尔·哈维（Sándor Harvey）《符号学前景》，*Semiotic perspectives*（伦敦，1982 第 8 页）

② 阿谢姆·艾斯巴赫（Achim Esbach）、朱根·特拉班（Jürgen Trabandt）合编《符号学史》（*History of semiotics*）一书，本杰明斯，1983 第 27 页。至今，没有一项任务得到了满意的实现。

实的历史当然还没有很快写出来)对符号学理论做这种介绍,对于一门成熟的科学来说是无法想像的相反对于一项刚刚开始而且说真的还只有很少值得介绍的特殊论题的科学设想来说这种介绍更可以说是一种需要。

## 第一部分

# 索绪尔与符号学



## 第一章 难以说清的波折

20 世纪的语言学与符号学思考，在很大意义上是被索绪尔的研究成果主导着。他的研究成果至少在欧洲引起了对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彻底的重新审视。虽然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思考（纳维尔 [A. Naville] 《科学之分类》[ *Classification des sciences* ]）由于继承了奥古斯特·孔特<sup>①</sup>的乐观主义而已经将“心理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经济社会学）放进了诸如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定理性科学的“规律科学”之中，但索绪尔似乎仍然是有理由成为将语言学置于严密科学之内的第一位理论家。而且，毫无疑问，他的首批听众（例如阿勒贝尔·薛施蔼 [Albert Sechehaye] 1930 年发表在《心理学杂志》[ *Journal de Psychologie* ] 上的《语言学幻影》[ *Les mirages linguistiques* ]一文）和其听众的听众（例如亨利·弗雷 [Henri Frei] 1950 年在第 9 期《索绪尔手册》[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 上发表的《索绪尔反索绪尔》[ *Saussure contre Saussure?* ]一文），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位日内瓦的老师，就像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自称的

① 奥古斯特·孔特 (Auguste Comte, 1798—1857)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译注

那样)的‘普遍相对论’真真切切地成了言语活动现象之真正理性的理论化研究的第一个行为。

后来的问题便是要知道 索绪尔在彻底朝此努力之后 是否最终也可以表述出被确定为具有“有条件的必然关系”(纳维尔 第 30 页)的那些陈述的第一批语言学规则。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可比之于第一个建立近代物理学之构成性数字规律的伽里略?(在其之后,物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发现都属于是对于这种特定规律的纯粹的扩张应用。)他是否可以像第一个提出化学成分组合方程式的拉瓦锡,或是像系统植物学及其分类的创始人林内<sup>②</sup> 他是否最终使语言学“具有了个性”保证其获得自立科学的地位并以准确科学的方式来掌握其对象了呢?人们能否希望这项工作在因其几位学生的热情而得以流传下来的这部片段性著述中被证实完成了呢?还需要考虑,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知识是否可以自我证实是积累性的,从而使其可以在那些建立起符号及其意义之理论的人们中间(从叶尔姆斯列夫 到格雷玛斯<sup>④</sup> 中经特鲁别茨柯依<sup>⑤</sup>、雅格布森<sup>⑥</sup>和普洛普<sup>⑦</sup>)

- ① 拉瓦锡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 法国化学家。——译注
- ② 林内 Carl Van Linné, 1707—1778) 瑞典自然科学家。——译注
- ③ 叶尔姆斯列夫 Louis Hjelmslev, 1899—1965) 丹麦语言学家。——译注
- ④ 格雷玛斯 A. —J. Greimas, 1917—1992) 立陶宛裔法国语言学家、著名符号学家。——译注
- ⑤ 特鲁别茨柯依 Nicolas Sergueievitch Troubetzkoï, 1890—1938) 俄国语言学家 现代音位学创始人 著有《音位学原理》(*Principes de phonologie*)。——译注
- ⑥ 雅格布森 (Romain Jakobson, 1896—1982) 俄裔美籍语言学家。——译注
- ⑦ 普洛普 (Vladimir Iakovlevitch Propp, 1895—1970) 俄国文艺理论家。——译注

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连续性。

相信对于这种语法知识的发掘史会带有皮维·德·沙瓦纳 在同一时期为索邦大学的墙面和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所形象地表现出的那种肃然静洁，也许是错误的。缅怀皮克泰<sup>②</sup> 德·索绪尔《科学论文集》<sup>③</sup> 会使人兴趣盎然地想到了一些“混乱的噩梦”，这些噩梦可比之于那些在语言学和符号学建立之初围而不散的噩梦，其目的是使之成为有着丰富内容和高度对立的研究领域。至于索绪尔的生平本身，也充满难以说清的波折，索绪尔 1878 年曾将和他时有联系的良师益友阿道尔·皮克泰与“其哲学家朋友（……乔治·桑等）的激烈争论归于这些，但是在索绪尔的生平之中 喧哗与骚动是服从于自由民的不动声色的静寂的。我们后面要对这些个人的悲剧做点介绍，因为它对于索绪尔的著述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将介绍其科学设想，最后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研究借以打算建立语言学特殊性也就是说建立当作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自立性的方式。

这个文本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可能是有关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种新的导论性文本。（已经存在着多种这样的导论，而且互不竞争 对于他这部著作的阐述非常之多。我们下面对于索绪尔理论的一些中心概念所做的介绍 仅仅限于能够指出 对于试

① 皮维·德·沙瓦纳 Pierre Cécil Puvion de Lavallée, 1824—1898) 法国画家。——译注

② 皮克泰 (Adolphe Pictet, 1799—1875) 瑞士古生物学家。——译注

③ 索绪尔《科学论文集》(*Recueil des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 日内瓦, 1922 年 第 393 页：“一些观念世界彻底动摇了，它们具有着对立的、不可协调的形式，在属于噩梦的一种混乱中相撞……”。这是引文 (1)。索绪尔对重要的引文都这样标上了号码：从 (1) 至 (24)。

图理解符号学新的广泛领域起源的人来说，这便是大门和必经之路。

1878年菲尔南德·德·索绪尔在莱比锡撰写《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两位主要代表，卡尔·布吕格曼(Karl Brugmann)和埃尔曼·奥斯托霍夫(Hermann Osthoff)他们反对这位天才的大学生的研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科学与个人的对立，并以他们的不理解而在德国建立起一个很大的科学群体。二十五年之后，即1903年在一篇于后人看来是为了捍卫这一研究工作的科学革新之特点的文章中，索绪尔透露了一些失望心态，仍然强烈地被人感觉到)他则将此归咎于这两位教授。他以某种闪烁其词的方式结束了这篇有缺陷的文章，而这种方式也遭到了当时其莱比锡对手们的严厉谴责：(2)“研究语言学，必须在不受某种观察或某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进行，以便从一开始就平等地去安排一种现象例如音位规律(这是个人经验所不能观察到的作用)和每个人从儿童时就由其自己意识到的类比行为。这就是德国人的温顺表现”。这便是其“对于童年和研究的记忆”(《索绪尔手册》第17期第25页)。

这些话保留了索绪尔生活中多次表现出的动荡和秘密内容的痕迹。这些话相当准确地说明了《索绪尔情况》也就是《索绪尔现象》。《索绪尔情况》概述了一位严肃学者的生活，其非常零散的生平记录，通常显示他既被动荡的悲剧所折磨，同时又被一种有感染力的热情所占有。《索绪尔现象》记录了一部作品的灾难、消失与浮起，以及后来无可改变的光辉，然而，它也许仍不大被人所了解。

## 一、索绪尔情况：一个严肃生命的秘密悲剧

( 1857—1913 )

索绪尔留下的信件和自传性文字片段《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 第 21 期 ) 尤其是其朋友和学生的证明 构筑了一位专心进行智力研究的严肃学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完全是在欧洲几处重要的知识殿堂里展现过的：索绪尔在接受教育之后（特别是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并同时学习语言学之后），他的活动便没有离开莱比锡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后来到了日内瓦大学。他发现待在莱比锡使他失望。自 1881 年 10 月，他来到巴黎上大学，他几乎立即接受了在高等研究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首次任课的工作，并经常积极地出现在语言学学会上，因为他从 1876 年起就是该学会的会员。但是，1891 年，他拒绝了弥补米歇尔·布雷亚尔（Michel Bréal）在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的位置。在教书十年之后，他“带着他所有同事们的遗憾”（因为他被授予了荣誉勋章）而回到了日内瓦。他在日内瓦担任了“专门为他设立的”一个讲台（梵语与印欧语言），他讲了二十一年，直至他辞世（1913），他每一年讲一门完整的梵语课。关于他在日内瓦的这些年的讲授活动，图利奥·德·莫罗（Tullio de Mauro）<sup>①</sup>曾经指出（第 344 页）：“1897 年，就是在日内瓦，开始形成了一组忠实于他的高才弟子，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的课

关于索绪尔的生平，请参阅图利奥·德·莫罗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介绍，Payot 出版社，1972 年，第 319—389 页。

程才变得更为特定、更为丰富和充实”。不过，人们注意到，1894 年的“东方学学者大会”之后，索绪尔与外界很少联系，他对外的通讯也变得间隔很长和无规律可循。索绪尔自己说患上了“写信恐怖症”（*épistolophobie*）。而他发表文章，他的明显的科学活动，也变得很少，至少在纯粹的语言学界是这样。这时，他对史诗《尼伯龙根》<sup>①</sup>和他从荷马诗歌中而更经常是从印欧诗歌中分离出的字母位置变形词<sup>②</sup>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1905 年，普通语言学和欧洲语言史的讲座教授尤素夫·韦特海默（*Joseph Wertheimer*）退休了，而从 1876 年就在日内瓦学习语言学的索绪尔过去曾经有意地避开了他的课。这时，他却安排继承了这一课程。因此，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有关语言学理论化的直觉才重新被唤起和公诸于众。他于 1894 年 1 月写给梅耶（*A. Meillet*）的信中已经谈过这种想法，他说要为此写一本书，已经有所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很有必要但却无法完成（《索绪尔手册》第 21 期，第 95 页），而实际上，这本书一直未能由他来完成：（3）“不论我愿意与否，这一切都将成为一本书，

① 《尼伯龙根》（*Nibelungen*）：根据日尔曼同名神话于 13 世纪创作的史诗。——译注

② 字母位置变形词（*anagrammes*）：组成一个隐蔽的专有名词的发音或字母，会在诗歌文本的表面分散开来，而使这个名词的出现从根本上讲对于诗歌的智力活动都是必要的。奥古斯特·孔特《与人类的正常状态有关的概念的主观综合或通用系统》*Synthèse subjective ou système universel des conceptions propres à l'état normal de l'humanité*（1856）曾经赋予字母位置变形词特别的重视。但是，如果确实在索绪尔与孔特之间显示出许多接近的话，由于作为思想家的孔特对于 20 世纪的整个科学思考都具有重大的影响，那么，人们贬低索绪尔同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借以摆脱实证主义的方式，就大错而特错了。

书中 我将既无热情也无激情地解释 为什么在语言学上使用的词语没有一个我可以赋予其某种意义。我承认,只有在此之后,我才可以重新开始我以前放下的研究工作”。这些语言学思想想必提供了他三次上课的内容(1906—1907,1908—1909,1910—1911),这些内容便是在他辞世两年之后由其两位学生巴利 Ch. Bally 和阿勒贝尔·薛施蔼依据多种笔记和索绪尔自己的亲笔记录(某些笔记可追溯到给梅耶写信的年代)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的来源。

因此 这种严肃学者的隐蔽生活 就像是充满了断裂 并在不同深度上带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悲剧 对于这些 我们从这些断裂、这些突然的离去和默然不语中可以看出。借助于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字即《关于童年和研究的回忆》<sup>①</sup> 人们了解到某种带强烈敏感性的东西。有关对于童年的刺人心痛的回忆(这种回忆也是由一个 15 岁的孩子对于真正的科学发现的回忆)这篇文字表达了一种恐惧和一种失望 因为 到了 1903 年 也就是在这一事件发生超过二十五年之后(尽管有着明确的漠视:(4) “我对于在科学上获得的和并不需要任何名称的东西,于神圣的惧怕之中 感觉到了某种个人的返回”)这种恐惧和失望仍没有消失:1872 年,当索绪尔还是一名按照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中学进行重读的学生的时侯,他遇到了一种古希腊语词语变化的特殊情况:(4’)“在我看到 *τεταχεται* 的那一时刻…… 当时我的注意力极为分散 就像我重读一年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吸引了过去 因为我刚刚进行过这样的推理 这

<sup>①</sup> 施特赖特贝格 (Streitberg) 教授,是索绪尔明确指定的这篇短文的持有者 (《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1960)

时它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lambda\epsilon\gamma\omicron\mu\epsilon\theta\alpha:\lambda\epsilon\gamma\omicron\nu\tau\alpha\iota$ ，因此， $\tau\epsilon\tau\alpha\gamma\mu\epsilon\theta\alpha:\tau\epsilon\tau\alpha\chi\eta\tau\alpha\iota$  于是， $N=\alpha$ ”。

这时的索绪尔刚刚发现了《鼻音共鸣》(*nasalis sonans*)<sup>①</sup>一书。三年之后，在他到达莱比锡的时候，他想必是惊异地了解到(4'')“几个星期以来，围绕着了解某些希腊字母  $\alpha$  是否不来自于  $n$  或者某些  $n$  不产生  $\alpha$  的问题 闹得沸沸扬扬。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我与一位德国学者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他把我三年半前的发现当作一项科学征服来介绍，而我当时将我的发现看做是我不敢去谈论的某种基础性的真实，因为它太为人所知了 我腼腆地对 H 先生说，这一点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或者是新颖 …… ]人们后来在我的《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找不到我先于布吕格曼就了解鼻音的任何痕迹……这已经不是争回当初没有去争的优先发现权的时刻了 [ …… ]我在《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做了更多的介绍 我回想起我是怀着某种痛心去这样做的 因为那是对我写作时的情况的最好的评论。我说：多亏了布吕格曼先生和奥斯特霍夫先生的研究工作，我们知道了  $n$  和  $r$  要知道 我个人既不需要布吕格曼 也不需要奥斯特霍夫”(《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 第 18—24 页节选 )

对于他突然返回日内瓦之后的年代，邦维尼斯特 在评论索绪尔相对的科研沉默时说 这是“思想的悲剧”(《索绪尔手册》第 20 期 第 12 页)，并且他采用智力的词语解释索绪尔

卡尔·布吕格曼 1876 年的著述。——译注

邦维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 20 世纪法国著名语言学家 著有《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译注

1894年1月4日写给梅耶的信件中的著名片段<sup>3)</sup>。大概,对于索绪尔的这种隐蔽的感情生活的更为深入的调查以及对其某些自传文字的真正风格分析,可以看出其智力情感上的破坏性力量。从其最大的快乐方面来讲,那便是对于一位卢梭式人物的爱好:(5)“可尊敬的阿道夫·皮克泰即《印欧起源》(*Les 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一书的作者,是我家有一年在农村时的邻居,当时我12岁或13岁。我在他家靠近维尔苏瓦(Versoix)的马拉尼(Malagny)宅地上经常见到他,尽管我当时不大敢向这位杰出的老人提出问题,但我默默地对他的书产生了一种深在的和孩提式的敬重,因为对于这本书,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几个章节。借助于某些梵语的音节来重新了解已经消失了的人们的想法(因为这是当时的书籍和整个语言学研究的想法),以一种天真的前所未有的热情激励着我;我对于语言学兴趣的记忆,远没有对于至今经常泛起的对童年时的贪婪阅读的记忆更为美好和更为真切”(《索绪尔手册》第17期第16页)。

关于抑郁的“激情”,科学研究上的变化甚至可以留下一些痕迹:(6)“我不得不从我文章中撤回一些观点……尤其是,  $A\gamma$  与出自  $\gamma$  的音位的相像,曾导致我不自愿地放弃了流体和共鸣鼻音的理论,而我在成熟地思考之后,又回到了这种理论”(索绪尔:《科学论文集》第3页,也可参照第379页)。

用于撰写《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手写的科学附注,并不是无争议和无悲剧的:(6')“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来以语言学的名义维持我们每天都在认真地反对的属于所有的错误、所有难以分辨的骗局的一种虚假的、生发性的一致性……”(恩格勒:《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IV,23和其他地方第24—25页)或者是:(6'')在承认薛施葛将语言变